



重塑市民的体育观念：与体育社会学学者陆小聪谈城市体育发展问题

乔冉

摘要：以专家访谈法为主，以文献综述法为辅，在对上海体育的过去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上海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的前行，体育也到了转型发展的时期，大众体育、终身体育等以每个个体为重的体育观成为了主导，然而在国家意识到体育应走全民路线的时候，市民的体育观却尚不完备，市民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偏差，所以，重塑市民的体育观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想要保证市民稳定地参与运动，并从运动中获得更多的乐趣，构建体育社团将是最有效且易行的办法。

关键词：市民；城市；体育认知；体育社团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6)03-0043-05

Reshaping the Public's Concept of Sports: 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Sports with Lu Xiaocong, a Scholar of Sport Sociology

QIAO Ran

(Freelancer,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By the chief method of expert interview and the supplementary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Shanghai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atus of the sports in the city.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sport has come to a period of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Mass sports and lifelong sports, which lay stress on individuals,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concepts. Yet, at a moment when the state is aware of the necessity of sport for all, the citizens' awareness of sports is incomplete and biase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reshape the citizens' sport concept. The establishment of sport associations is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way to ensure the consist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citizens in exercise and get more fun out of sports.

Key Words: citizen; city; sports cognition; sport association

陆小聪，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体育人类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1973—1978年为上海市乒乓球队运动员，1987年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1年在日本体育大学获得体育科学博士学位。

访谈地点：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办公室

访谈时间：2016年3月30日下午

1 上海体育特质的历史成因

中国的海岸线绵延1.8万多公里，19世纪中后叶，通商口岸也非屈指可数，为何独上海异军突起，受众家青睐，成为国际大都市。为什么是上海？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学者能够尽述。姑且将其束之高阁，撇去疑虑，但看表征。上海成为西侨移居的首选，它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侨民眼中，巴黎的城市规划尚有瑕疵，而上海则是“白羽素丝，随

其所染”^[1]，上海成了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最优秀的建筑艺术工艺的试验田。

体育是身体的艺术，而城市与身体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亨利·德·孟德维尔认为，城市是“身体彼此连结的空间”^[2]；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城市是“有等级的身体生活空间”^[2]。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将身体科学引入城市设计的例子，好像普莱特纳的让皮肤呼吸的理论影响到18世纪40年代后英国及欧洲的一些城市（如巴黎）的街道外观设计；“哈维在血液循环以及呼吸方面的发现，……启蒙运动的设计者便运用了这些观念来设计城市。设计者想让城市变成一个人们可以在当中自由移动与呼吸的地方。”^[2]为身体而服务的城市营造理念在上海租界的建设中也得到了体现。

最初主导上海租界的是英国人。“开埠初，英国人是在上海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外国人群体。据不完全统计，1852年上海已有外国侨民三百余人，而其中四分之三是英国人。”^[3]工业革命不仅影响到英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

收稿日期：2016-04-23

作者简介：乔冉，女，栏目特约撰稿人。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史，体育文化学。E-mail: qiaoran2014@126.com。

作者单位：自由撰稿人，上海 200030。



地位,还令其体育有了质的跃进,英国也便成了国际公认的现代体育的重要发源地。英国人实体进入上海的同时,其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来,其中就包含了日常的休闲活动和正规的竞技比赛。西侨将体育视为休闲方式、交际手段以及挣钱工具。为此服务的体育场所也拔地而起,改变了城市的面貌。

上海第一处跑马场始建于1850年,于“南京东路河南路往西一带,占地53 333 m²”^[4],市民俗称的跑马厅则是1863年建在“西藏中路以西、南京路以南约286 667 m²土地”^[4]上的。1864年,英国总会大楼建成并正式开放,楼内有2个弹子房、1个保龄球房和棋牌室。1870年,海南路10号一带建起了老虎山靶子场。1879年,斜桥总会在南京西路青海路路口创建,俱乐部内设有台球房、棋牌室、12个网球场和1个小型高尔夫球场。1882年,张叔和建张园,园内设有弹子房、舞池等体育场所,1885年对外开放后,更是市民娱乐健身的好地方。1892年,西侨在跑马厅东北部建游泳池。1903年,德国人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一带建乡村俱乐部,设有“网球场、棒球场、草地滚球场和露天溜冰场”^[4]。1904年,法商球场总会在环龙路创建,俱乐部设有“弹子房、酒吧、餐厅、击剑室和室外网球场”^[4]。1928年,占地约77 333 m²的逸园跑狗场建成,除了6条跑狗道外,“内圈为标准足球场,并有……小高尔夫球场。”^[4]1930年,回力球场建成,除了回力球比赛,还举办拳击比赛。设施完备后,比赛便得以开展。1858年,西侨在跑马场举行了板球赛。1890年,圣约翰大学举行以田径为主的运动会。1902年,西联会组织第一届“史考托杯”足球赛。同年,张园出现自行车赛。1904年,上海万国竞走赛和越野赛跑开赛。

面对来势汹涌的现代运动项目,中国人的反应各有不同。由于金钱和身份的局限,普通民众没有更多的选择,或置之不理,或去观看比赛。中上层市民多西化,逐步将竞技体育和休闲运动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就以买办梁炎卿的家族为例,讲述他们接受西人的生活理念,将打网球和骑马作为日常的娱乐方式^[5]。还有一部分热血人士选择了效仿西人进行运动,组建俱乐部并建筑属于中国人的体育场所,且尝试在体育方面超越西侨,尤其是在强身健体、保家卫国思想的激励下,中国体育得到飞速发展。

1905—1910年间,体操会爆发式成立。1923年,程贻泽组织了“三育体育会”,并用自家南京西路胶州路附近几十亩地为体育会建造了小型足球场。1924年,为摆脱西人对体育的控制,中华体育协进会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同年,沈嗣良发起中华足球联合会。1926年,李惠堂等成立乐华足球队。同年,范回春等建远东公共体育场。1927年,程贻泽又组织了“优游体育会”,并在北京西路泰兴路东一带建造运动场,运动场包括4个草地网球场,1个硬地网球场,1个单壁墙手球场,还有篮球房和游泳池。1928年,陆礼华等组建中国游泳会。1930年,第一届全市运动会在中华运动场举行。不仅民间人士为上海体育做出了贡献,政府同样提倡人们参与运动,“1930年代国民党的宣传就明确指出,民族的振兴取决于每位公民

的强壮体魄。……大众杂志上为了迎合妇女健身的口味,也刊登身着泳装的明星或为脚踏车打气的女郎的大幅照片。”^[6]

建国后,上海的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农民体育以及残疾人体育都办得有声有色,1958年、1988年、1989年3次大型体育活动周和1949年、1957年、1958年、1965年、1969年大规模的渡江游泳活动是其中的佼佼者。综上所述,上海有优秀的体育基因,而且有很多的体育文化遗产。

想洞悉上海体育如何行未来之路,就要先了解其往昔,“明镜所以鉴形者也,有妍蚩刚见之于外;往事所以鉴心者也,有善恶则省之于内。”^[7]尽管笔者在书籍上看过相关的材料,但仍然希望从面前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口中得到印证和拓展,所以,我们的讨论就从上海体育的生发开始。

陆小聪(以下简称陆):德国的体操、英国的户外运动和美国的球类运动是现代西方体育的主要来源。而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通过德国体操的衍生产品,即兵式体操在洋务派开办的军事学堂中作为正式科目得以实现的。最初主要聘请英国、法国和美国军官担任教习,内容为英美兵操,1896年以后,则以德日兵操为主,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和福州等地得到推广(熊晓正等,1997)。西方现代竞技体育在上海的传播则有两个重要的途径,一是通过教会学校开展多种竞技体育活动,二是藉由当时在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力量,组织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上海曾经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居,出现了众多的教会学校。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外国殖民者在上海共创立学校61所,其中小学33所,中学25所,大学3所,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学。西方的现代体育首先通过这些教会学校得到最初的开展。另外,基督教青年会在早期的西方体育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培训体育人才,引进体育项目外,在组织各种体育竞赛,包括大型的体育运动会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1919年由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艾思诺为主筹办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迫认为民国时期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早期的上海在西方现代体育的引入和传播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桥头堡,相比其他地区而言,体育活动在当时上海的一些有闲阶层中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乔冉(以下简称乔):建国后国家的体育政策有哪些变化和发展?

陆:建国初期体育的基本国策是推进国民体育,这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在教会学校中盛行的选手体育进行反思的结果。因此,国民体育政策实施的对象是国民全体,主要目标是强身健体,基本手段是体育活动的经常化和普及化。比如在1951年推出的“广播体操运动”等。1952年以后,国家的体育政策以赫尔辛基奥运会为契机,有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正式组建了作为政府机构的国家体委,在“体育与普及相结合”的政策目标下,以提高竞技运动水平为目的的三级训练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了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

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



那时候上海的体育发展得怎样?

陆: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的时候,高校都停止了招生,初中或高中毕业就意味着要插队到农村去。城市的孩子不想去农村怎么办呢,一个是做文艺兵,一个是做体育兵,但是你必须要有天赋,首先要能够进入校队,成绩优秀的才有可能被选拔进各级体校,最后才能进入省市体工队。我是13岁那年成为上海乒乓球队的一员的,一年转正以后就可以每月像大人们一样领取工资,而且免费的伙食标准比工资还高一点。你想,在当时经济短缺、供给匮乏的年代,这么小年纪,在众多同龄孩子中脱颖而出,穿的运动服上写的“上海”两字,足以让你有一种自豪感。那个年代,电视还没普及,学习工作之余的娱乐就指望体育活动了,所以,那时的体育倒是有一种全民参与的性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以前是读书无用论,后来变成千军万马过高考这一座独木桥。曾经有过一个研究,专门探讨家长对于子女从事体育的态度问题,较高比例的家长不鼓励子女参加体育训练,原因很简单,因为相比成为优秀运动员,参加高考有更高的成功率,子女的前途更有保障。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读书风气是出奇的好,几乎是全民读书,尤其在城市里。读书最早热的是美学,后来大家又热衷于文化研究,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乔:改革开放后,大家的注意力又转到商业上,运动在市民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陆: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家都忙着挣钱,你穿一身运动服出来,人家会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大家都被物质主义淹没了,没人会放慢脚步想一想生活究竟该怎么过,很少有人会把体育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乔:那现在呢,大学扩招导致现在的读书风潮没有当年那么强劲了,人们的经济水平也提高了,开始有提高生活质量的诉求了,身体主义是否已经开始回暖?

陆:我觉得现在多少有了一些回归的迹象,但还不是主流。现在推进全民健身,我们首先必须想清楚老百姓究竟需要的是是什么。我们要想根本解决市民体育参与的问题,首先应该去分析的是市民的生活态度问题。现在上海参与体育的人的确是多了一些,但更多的人还是不会运动,离将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差很远。这不单是体育问题,也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2016年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有一个关于中间阶层的调查,结果是虽然具有中间阶层的职业及其收入,但中间阶层的自我意识及其相关的生活方式尚未形成。也就是说中国的中间阶层从职业、收入上来看已经是一个成型的阶层,但与下一阶层之间在生活态度上却差别不大。

近年来,体育作为一种休闲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推崇。而政府也致力于在今后的10年间把申城打造成一流的赛事之都、体育资源的配置中心以及体育科技创新的平台。上海网球大师赛、国际田联钻石联赛、F1中国大奖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等高水平国际赛事的引进和举办,满足了市民的观赛需求。平均每月十多家居体育机构到工商局注册体现了体育产业的繁荣。沪上的商业资本也开始利用明星效应带动体育的发展,例如,2015年9

月23日,国际传奇冠军赛在虹口足球场打响,中国元老队与皇马元老队正面交锋。2016年4月17日,中欧全明星嘉年华足球赛在上海举办,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同场竞技。以明星吸引市民眼球,带动市民参与运动未尝不是一种办法。

2 城市体育发展之重在于提升民众对体育的认知

体育空间和设施的完备是市民参与运动的促进器。现在关于体育空间的建设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建,一个是拆。一座城的城市体育记忆可能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体育空间,一个标志性的时间段,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性体育建筑的价值在于其精神象征,它是城市的风向标,是市民的集体记忆,其长久的仪式价值远远高于即时的实用价值。但上海要不要建设标志性的体育场馆,场馆建成后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谁,还有巨额的维护费用由谁来承担,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建或者拆除现有的不合时宜的体育场所是另一个恼人的问题。很多体育设施和场地闲置在那,在资源配置的角度上看,似有些浪费,但尘埃下深藏的花纹是市民尘封在心底的珍贵记忆,所以对这些处在冷宫中的体育资源的重新安排需要格外的谨慎。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说:“人的一生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8]体育场馆和实体里有市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体育是市民城市记忆的一部分,然而,很多标志性的体育场所已从上海消失,人们只能从繁冗的档案中去追寻他的身影,从积压如山的报纸中追忆他的故事。城市的体育记忆随着体育建筑实体的消失而逐步淡出人们的脑海,不免让人惋惜。无为而治是中国千年的智慧,如果不能看到改建的体育场百年后的面貌,那么一动不如一静。丘吉尔说:“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9]保护老建筑是每个国家都在做的事,1882年,英国出台《古迹保护法案》,而后又成立了“国家信托”机构以便保护老建筑。1913年,法国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法》,法案规定对受保护的建筑做出任何的变动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并征求公众意见。幸而,上海市政府对此也有了积极的态度,2007年,《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得到批准,12个风貌区、64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将不需再接受变更的命运考验。

上海有着完整且成熟的市民阶层,几乎每一项体育运动都能在上海找到生长的土壤。现在很尴尬的一种境遇是,政府将体育设施、体育资源派送到市民身边,但市民却置若罔闻,不理睬,不使用。

当人们有了运动诉求,体育的生命力就会变得异常顽强,非外力所能阻挡。种族歧视缔造了巴西足球的精巧,圈圈的铁链成就了形意门中的半步崩拳,而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形成了独特的弄堂体育文化。空间的不足没有扼杀民众的体育热情和实践,反而塑造了上海体育的特性。

现在上海的中年人几乎没有不会打乒乓球的,这不因“上海是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10]它是那个特殊年代缔造的产物。“凡是无拘束的游戏,也就是嬉戏,往往产生



于条件简陋、管束不严的时代。在1960年代,中国乒乓球异军突起,在叱咤风云的五虎将中,上海就有徐寅生、李富荣、张燮琳占了三席。……乒乓球是最符合当时上海少年的理想,也最符合上海的弄堂、小马路的市井文化,也最符合当时经济极不发达、文体设施一片苍白的生活环境。”^[1]从中可以看出,体育空间和设施是贫乏还是丰富并不能有效地左右市民的身体行为,唯内心拥有运动意识和运动冲动才能令市民参与体育活动。对体育的认知问题也是陆小聪一再提及的。

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我们建设国际著名的体育城的价值取向和诉求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最终的诉求应该是让体育惠及市民,通过体育使上海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充满生活意义的城市,市民可以从中充分享受到体育带来的生活乐趣。国际体育赛事的意义在于重要的观赏价值,同时给予市民一种体育示范作用。明星的榜样是和市民的体育参与正相关的。其实建造一个体育场所,培养几个冠军还是相对容易的,最难的是让市民都动起来。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要改变体育的发展方式。那我们首先就要考虑,为什么老百姓的体育参与度这么低。

乔:在您看来,为什么外在的条件具备了,但市民还是没有运动的热情?

陆:我们从政府公共服务的层面上来讨论这个问题,要提高百姓的体育参与度,是不是让市民出来了就行了。第一届市民运动会,统计下来有600多万人次参加,事实上,这种比赛对市民参与体育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市民对体育的态度,包括他的基本生活态度有无根本的改变。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间压缩,比如中国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需要花几百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物质条件改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在人的精神意识层面却由于这样的时间压缩来不及消化,来不及回味,跟不上物质的发展速度。苏格拉底讲,“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忙得来不及去想,因为太快了,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所以就跟着惯性走,以前怎样就怎样,尽管现在生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现在人们的经济条件,花点钱打个球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很多人的词典里,没有体育这个词,即使有,也可能是与负面的意义有关。因此,根本的理念不改,你搞再多的设施、场馆、项目、活动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市民对体育有内在需求的时候,外在的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乔:您在日本留学多年,日本市民对体育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陆:我1992年去日本留学,刚去的时候要读书,还要打工,到星期天总算是有一天休息,就穿着西服出去逛街,结果一上电车,发现日本人都穿着运动服或休闲服,挎着球包打球去了,有的人拿着赛马的报纸在看。日本人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下班以后,他就转换成一个生活的角色,怎么开心怎么玩,节假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爱好,打球呀、爬山呀等等,体育活动成为日本人度过闲暇时光的重要内容。

乔:您也曾到英国利兹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英国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体育呢?

陆:刚到英国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熟人,所以就参加了一个网球俱乐部,在俱乐部里结交了一些球友。我曾经问一个球友,你们英国人业余时间都在干嘛?他说只要不下雨,天气好,谁都不会待在家里面,每个人都会出门去,大致有两种选择,或者在室外打球,或者去酒吧喝酒。为什么要去酒吧喝酒,一来是因为英国人爱喝啤酒,二是因为在酒吧里看球赛不要钱,英国的电视节目是要付费的,而在酒吧看球则是免费的,一扎啤酒才两个英镑,在酒吧既喝了酒,又看了球,还可以和朋友聊聊天。

乔:您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入的提高,现在市民对待体育的态度有没有进步?

陆:中国百姓对体育的认知问题,我认为这几年已经好很多了。如果人家问你今天干嘛去了,你说打网球或者打高尔夫去了,人们都觉得“高大上”,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你穿着运动衣,跨个球包出去,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现在人们对于体育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很多,尤其是年轻的白领,经常去健身房呀,一起打球呀等等。在闲暇时间里有人喜欢玩游戏,也有人喜欢玩体育,或者有人喜欢睡懒觉,各玩各的,可以认为这是价值多元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乔:现在媒体和政府都在积极地引导人们参与体育运动,您认为他们现在做的事能够影响到市民的体育观吗?

陆:现在这么多媒体传播体育信息,我觉得媒体不应仅报道一场比赛而已,而应该围绕比赛展现更多的体育精神及其美感。记得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在当时很有名的足球明星叫中田英寿,在意大利拉齐奥踢过球的。由于媒体对他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全面报道,包括他的足球技术、个人癖好、他对生活的理解,甚至时尚品位等,中田英寿成了当时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因此激励了大批的青少年参加到足球活动当中。由此可见,媒体是可以引导人们对于体育的态度的。

乔:现在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提高市民的体育参与度呢?

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提出要推进国民体育的发展,它的实现途径是促进国民体育活动的经常化,经常化这个提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与现在提倡的体育生活化有一脉相承的含义。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是用项目制的方式来做的,通过一个一个项目活动来配置资源,这些项目结束以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种现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话虽老但却有道理。媒体为在竞争中得以生存自然会提高节目的质量,商人为获得更多的市场配额会主动推陈出新,而政府需要做的是提高市民对体育的认知。纵然民众的体育意识提高对所有从事与体育相关的事业的人员利好,但这件没有即时利益可谋的百年大计,只有少数民间人士愿意为之付出,所以,政府应有此担当,有耐心行此事,将对体育的认知纳入义务教育体制内,从小培养人们的运动意识,植根于幼小心灵的理念将左右人的一生。



3 市民体育应朝着社团化方向发展

如果竞技体育是出戏,那么,他是悲剧,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因为他要书写英雄史诗,这与现代主义提倡的每个个体皆有价值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但这就是竞技体育,人们观看体育的初衷也是如此。市民体育则恰恰相反,他更适合以大团圆结局的家庭剧做比,因为每个参与的个体皆有价值,运动是他们慰藉灵魂的方式。体育在这个场域下不再是竞技,更多的是游戏成分。

有组织的体育社团是契约制在民间体育上的表现,一般都采取会员制,缴纳会费并享有权利。老上海的西侨们就是参加体育俱乐部来忘记羁旅之愁的,《上海的英国人》中有位英人回忆说:“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有很多俱乐部,每个国家和每项运动都离不开俱乐部。”^[1]那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总会,像英国总会、斜桥总会、法国总会、德国乡下总会、美国哥伦比亚总会、俄国总会。每个项目也有自己的联合会,像板球总会、打靶总会、杓球(高尔夫)总会、拍球总会、曲棍球总会、勒拜别球(英式橄榄球)总会、游泳总会、西联会(上海足球联合会)等。俱乐部是人们运动的基本组织形式。

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体育好坏的重要标准有3个,一是职业竞技联盟是否成熟,因为有联盟自然会有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体育产业也便应运而生;二是看本国或者本民族的赛事是否兴盛;三是看是否有体育嘉年华活动,这象征着一个国家体育和城市文化的对接和融合。打专业比赛的队伍被称为俱乐部,民间组织的小团体同样叫做俱乐部。有共同爱好的人自发地组织在一起,稳定地进行运动,这是陆小聪认为城市体育未来该走的路。

陆:2005年,全国的体育人口是29%,2015年,全国的体育人口上升到33.9%,上海的体育人口是38.4%,这个数据的基础指标是一个人一周运动1次,1次半个小时。还有一种叫组织体育人口,我觉得这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散兵游勇式的运动是有时间就去玩,没时间就算了,找不到一起玩的人也就不去了。组织体育人口是指通过参加一个俱乐部,或者体育团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的人,这样的体育人口,有固定的团队成员,相对稳定的活动时间和场所,这样就能保证在这个团队中的成员经常性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同时也将体育爱好者、体育场地、教练等资源得到高度的整合。体育参与的基本要素是要有时间、场所、伙伴和一定的经费,其中,伙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有一个研究体育原理的日本老教授,他70多岁的时候对我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体育,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体育的重要功能在于社交。市民的体育团体是非功利的,团队成员只是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因此可以为陌生人成为朋友提供一个契机,增强互相之间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归属感,这对社会生活十分重要。政府要做的首先是给这些体育社团或者俱乐部一个组织上的合法性,然后通过政策上的激励,培育发展这些体育社团,让更多的市民通过参与体育团队的方式开展体育活动,成为体育组织人口,从而实现体育活动的经常化和生活化。

4 结语

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化发展,使其拥有了不断流动的过客,来自全世界无根的驻者,以及土生土长的居民。这些人在经济、身份、文化上都是有差异的,唯一没有差异的是他们所拥有的体育权利。用现代主义的理念看体育,无论水平高低,每一个参与运动的人都是有价值的,需要被尊重的。市民体育关乎民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生老病死是人类尚不可抗拒的事,正因无法左右所以产生恐慌,而运动则是人们积极应对恐慌的方式。道教之所以被几世帝王之家崇尚,多因其养生之术和长生不老之理念。当死亡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母题之时,对抗身体衰老、疾病和死亡随之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运动因能强身健体、减少疾病、延缓衰老,甚至延年益寿,所以将伴随人类终生,一件相随终生之事当然值得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如何让市民享受运动的快乐,“如何让社会中具反应力的身体能找到感官上的舒适点,尤其是在城市里,身体就会变得不安而且孤独。”^[2]人们用眼睛去搜寻赛场上的激情,用耳朵去倾听运动后的呼吸和心跳,用嗓子为自己的英雄呐喊,用脚去丈量和体味居住的城市。美国人钟情于在街道上跑步是出了名的,很多国家的人也都有这个习惯,上海喜欢在道跑上慢跑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当身边的汽车呼啸而过,跑步就变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冒险行为,人们需要的是6车道的马路旁,一条由橡胶颗粒铺设的步行道,还是一条像武康路般静谧安宁的永不拓宽的街道?当身体游走在不规则的城市空间中,眼睛更愿意看到自由生长的绿,而不是中规中矩的灰,一座体育城应该是一座宜居城。

参考文献:

- [1] [北周]庾信.拟连珠.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614.
- [2]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8,158,254,254.
- [3] 薛理勇.老上海万国总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6.
- [4] 娄承浩、薛顺生编著.消逝的上海老建筑[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100,100,76,76,104.
- [5] 郎净.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87-188,32.
- [6]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M].王菊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190.
- [7] 张九龄.进千秋节金镜录表.曲江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516.
- [8] 朱铁臻.城市魅力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309.
- [9] [美]迪耶·萨迪奇、海伦·琼斯.建筑与民主[M].李白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扉页.
- [10]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200.
- [11] 马尚龙.为什么是上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65.

(责任编辑:陈建萍)